2022 年 9 月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Sep. 2022
第 24 卷第 5 期 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4 No. 5

国家公园建设中社区参与模式: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耿松涛[1,2] 张鸿霞[1]

(1. 海南大学 旅游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2. 新疆财经大学 旅游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摘 要] 完善国家公园体制是贯彻我国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实现途径之一。现阶段有效带动社区参与是解决制约公园建设进程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然而,复杂的社区背景因素和社区现存问题,给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带来了阻碍。为应对社区参与困境,引导居民积极参与,通过采用文献回顾法和归纳法,对社区参与从人地矛盾、社区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治理现代化方面展开详细分析,研究得出国家公园建设中社区参与模式的实践可从以下四方面进行:第一,拓宽社区参与渠道,形成居民主导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居民参与型的生态旅游模式、居民复合型的特许经营模式;第二,为居民参与提供充分的资金、法律、政策、制度保障;第三,注重培养居民参与能力;第四,全面提升居民环保意识。这些都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进一步助力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关键词] 国家公园 社区参与 理论逻辑 生态发展

DOI:10.13916/j.cnki.issn1671-511x.2022.05.011

为深入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国家公园成为一项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任务。现阶段,国家公园建设被称为“国之大者”。因此,如何建设我国国家公园,逐渐成为学者深入研究的热点话题。但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起步晚,2015 年才开始进行体制试点,截至 2019 年共设立了十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到 2021 年正式批复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作为第一批国家公园。近年来,各领域学者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探索集中于经验借鉴,主要包括借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建设经验,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国家公园的管理体制[1-3]、生态保护[4-5]、资金保障[6]等展开了系列研究。

然而,部分居民仍居住在我国国家公园一般保护区及周边范围内,为更好地推进国家公园建设,正确处理人地矛盾、引导社区居民参与是现阶段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也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7-9]。有效的社区参与机制是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公园长远发展的关键所在[10]。综上,为充分协调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利用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本研究以关注居民发展利益为基点,分析社区参与现状,探索国家公园建设中社区参与模式的实践路径。

一、社区参与面临的形势与难题

(一)复杂的社区背景因素

我国首批国家公园面积大、范围广,五大国家公园的保护面积累计达 23 万平方公里。国家公园往往跨越不同等级的行政管理,而各地区对社区及村落的管理方式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了公园内的社区发展极不平衡,加之受自然环境、历史人文等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国家公园社区背景十分复杂。

第一,国家公园面积大,社区居民分布分散。2021 年正式设立的首批国家公园,面积涉及我国青

[基金项目] 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高层次人才项目"生态文明视域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许经营体制及制度优化研究"(722RC634);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研究”(2021-GMB-020);海南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计划高层次人才项目“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背景下海南城市旅游效率时空演化格局、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2019RC153)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耿松涛,管理学博士,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财经大学天池计划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旅游创新业态。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海、西藏、四川、陕西、甘肃、吉林、黑龙江、海南、福建、江西等 10 个省份，是现阶段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地类型。由于我国人口多、分布广，国家公园一般保护区内仍然有部分居民居住。据统计，我国国家公园总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公园范围内及周边共有乡镇数量超过 200 个，行政村数量 350 多个，社区常住人口超 30 万，社区人口分布分散（表 1）。同时，国家公园的划定通常包含多片区域，在原有国家级、省级森林公园或景区等的基础上进行确立，所含范围甚广，所含保护地类型甚多，如三江源国家公园包括澜沧江源、黄河源、长江源园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包括尖峰岭、霸王岭、鹦哥岭、黎母山、五指山等多处区域。另外，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情况类似。钱江源作为我国首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其内部自然村落众多，4500 公顷的范围内分布着 64 个自然村，常住人口却仅 6835 人[11]。社区及村落众多且分散分布的状况，为我国国家公园的集中统一管理造成了多重困难。

表 1　我国国家公园社区情况统计①

国家公园	总面积（平方公里）	乡镇数量（个）	行政村数量（个）	社区人口（万人）
三江源	19.07 万	12	53	7.2074
大熊猫	2.2 万	151	N/A	12.08
东北虎豹	1.41 万	17	105	9.2993
热带雨林	4269	43	171	3.04
武夷山	1280	9	29	0.3
总计	23 万	232	358	31.9267

第二，社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产业结构单一。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资源既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地广大农牧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12]。居民生活保障来源于周边环境，居民长期从周边环境中获取资源，主要以种植、砍伐、捕猎、采矿为主的初级生产方式谋生，产业结构单一，社区经济水平不高，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另外随着三江源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保护区过多地强调生态而逐渐淡化对社区群众利益的关注，社区经济发展也面临新困难、新挑战，社区居民的生活保障也成为新问题。由于社区居民对自然环境的依存度较强，当地产业结构单一[13]，社区经济发展水平比城镇落后是现阶段我国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存在的重大现实困境，这影响了国家公园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三，社区居民受教育程度低。发展环境是教育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家公园范围内及周边的社区经济水平落后势必会造成居民生活、教育水平的落后。根据调研，我国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中，接受调查的 177 名原住民中有 62.15%的居民学历在初中以下[14]。笔者根据实地访谈研究归纳得出，由于社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以及生活环境与生存压力的影响，当地居民受教育水平有限，其中，社区居民多为小学或初级学历水平，高中毕业人群稀少，甚至存在部分从未受过基础教育的老年群体。国家公园社区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导致当地居民环保意识、生态可持续发展意识较弱，对国家公园的建设与保护缺乏参与积极性，给国家公园的建设带来了一定困难。

（二）社区参与现存的系列难题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国家公园建设面临社区背景复杂、经济落后、居民受教育程度低、生产生活方式落后等一系列现实困境，同时，这些因素也导致国家公园社区参与面临许多亟须解决的难题。

第一，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渠道短缺。2021 年我国国家公园结束部分试点进入首批正式建设期，但国家公园社区参与仍处于不断探索当中。国外研究表明，给予居民更多的就业权利，有助于提高社区参与积极性[15]，然而我国现有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方式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政府组织社区居民从事接待、保洁、表演、安保等一些非技术性工作，居民收入少，并未充分体现社区居民价值，难以使居民形成对国家公园的归属感，居民缺乏主人翁意识[16]。针对国家公园社区参与问题，国内学者表示居民参与渠道非常重要，通过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可采取生态补偿、社区共管、社区扶

① 数据来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官网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586/20211013/084838636866181.html，我国五大国家公园官网，国家公园各自相关规划文件，等等。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贫、社区旅游等方式[17]落实居民参与,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丰富的社区参与渠道并未全面实现,我国个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存在的居民参与,多以单一的政府安排为主导,不能充分体现当地居民的意愿与价值,不能适应社区现状。我国绝大多数国家公园仍存在社区参与渠道严重短缺的问题。

第二,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积极性不高。其一,周边社区居民的生计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一定程度上与国家公园保护目标存在冲突[18],保护国家公园往往导致社区本身利益被忽视,居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积极性降低。其二,我国国家公园在规划过程中涉及土地、资源权属划分,但存在对居民相关配套设施考虑不全、社区利益补偿机制不完善、对当地开拓新型经济发展方式支持力度不到位等问题,造成当地居民现有收益与之前收益相差较大,导致部分社区对国家公园建设产生排斥或抵触,进一步降低了其参与保护区建设的积极性[19]。

第三,社区居民参与特许经营的能力有限。我国国家公园提倡建立特许经营机制,实现公园"自身造血",而类比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研究表明,参与能力是决定山区社区居民能否参与森林旅游的重要条件[20],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居民作为参与当地特许经营活动的部分群体之一,其参与能力也直接决定了国家公园社区参与能否实现和特许经营活动的质量。由于我国社区居民受教育程度低,缺乏专业知识,未受专业环保能力训练,社区居民并不能胜任许多国家公园建设中的工作,加上部分社区居民观念较为落后,公园的建设在一定程度将改变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与生存方式,这导致社区居民并不完全认同国家公园管理与保护中的许多做法,从而也不能充分展现其参与能力,造成居民参与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活动能力有限。

第四,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不强。我国国家公园周边社区经济条件有限,发展方式单一,居民生活和生存所依赖的途径较少,当地社区面临较为严重的生存压力,因此在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过程中,居民环保意识不强,他们对经济利益的兴趣超过对公园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当地社区往往考虑更多的是公园开发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及商业机会[21]。此外,很多当地社区都是一些相对较小的乡村社区,他们通常受到教育水平的限制,不能对国家公园规划提出正确的判断[22],也缺乏对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利用的思考。社区居民消极的环境保护意识往往阻碍我国国家公园的快速发展和建设。因此,在缺乏外界引导的情况下,社区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加之社区居民受教育程度低造成观念落后,居民缺乏资源保护意识,造成社区居民生态环保意识低。

二、国家公园建设中社区参与的逻辑分析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坚持"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在完善生态保护的基础上,注重自然资源全民共享,协调国家公园周边原住居民利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而实现以利用促保护、以参与促和谐,鼓励社区居民参与是国家公园建设的必然选择。本文拟从人地矛盾逻辑、社区发展逻辑、生态文明建设逻辑、治理现代化逻辑展开分析(图1)。深入理解国家公园社区参与的理论逻辑,是鼓励参与的前提和基础。

社区(community)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广义上,社区即以一定的地理区域为前提,是所处共同地域内具有共同利益和归属感的社会群体[23];狭义上,社区是由居民本体意志推动所形成的以血缘、地缘、精神为纽带的共同体,侧重相互团结、相互统一的区域整体[24],强调居民之间的集体意识。在国家公园的社区权利讨论范围内,社区是利益相关者直接互动的场域[25],特指公园内可利用的利益范围,社区内所涉及群体是国家公园的重要利益相关者。针对国家公园社区(the Community of National Park)的具体概念,不同学者给出多样化的定义:国家公园的社区主要是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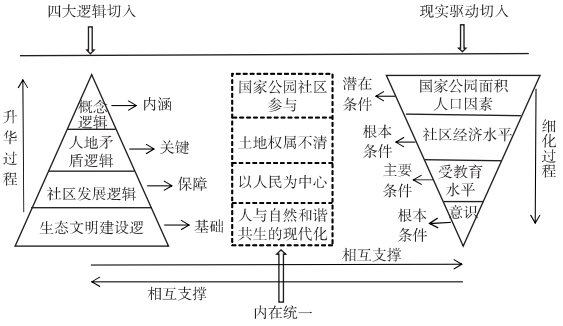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国家公园理论逻辑框架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生活在国家公园内部及毗邻区域的拥有共同价值体系、文化特征的群体，在其中世代居住、生产生活方式均有本地化特征的居民即原住民[26]；国家公园社区指居住在国家公园内部或周边地区，能够影响国家公园保护及管理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国家公园目标实现所影响的社会群体[27]。上述两种定义都强调国家公园社区主要指社区居民群体，前者强调社区居民生活在国家公园范围内及邻近区域的时间上的延续性，后者表明社区居民与国家公园目标实现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我国国家公园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区参与是实现国家公园与社区共生关系的基础，因此，国家公园社区参与指活动于国家公园范围内部及周边，并具有当地长期居住历史、世代传承的本土化特征及掌握当地社会文化特色的居民群体，通过一定方式加入到国家公园的发展建设中，进行资源环境保护或经营活动获取正当利益，确保社区与国家公园和谐共生。

（一）人地矛盾逻辑

20 世纪末，国外有 50%至 70%的保护地内有土著居民[28]，保护地与社区居民的矛盾一直是国内外诸多自然保护地面临的共同问题[29]。我国人口数量多、分布广，在国家公园范围内及周边均存在居民居住，但伴随着近年来城镇化建设、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的不断推进，部分偏远地区正逐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不可避免地会占用部分土地，生态用地与当地居民发展之间不可避免的会存在冲突。针对如何处理各项生态用地问题，人地矛盾成为首要面临和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研究表明社区参与程度越高，社区管理中的矛盾冲突越少[30]，社区参与越来越成为保护地良好建设的重要措施。而我国国家公园由于园区面积大，一方面，土地权属类型复杂，包括林地、草地、湖地、山地、部分耕地及部分建设用地等多种土地类型，且大多土地权属归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这造成国家公园土地权属划分不清、权属类型设置不当等问题; 另一方面，在一般保护区范围内有原住居民居住，这也导致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受到地、人关系约束[31]。因此，为解决人地关系冲突，减少居民发展与土地利用之间的矛盾，需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一刀切”地剥夺当地居民对原有土地的使用权是不现实的，将居民土地完全划归在国家公园范围内，仅依靠政府力量对土地进行开发对资源进行保护，而把居民排除在国家公园管理和保护之外，容易引起居民不满和社会冲突，不利于我国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甚至会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造成严重障碍。因此，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独特资源，实现国家资源全民共享，社区有效参与是缓解人地矛盾的关键。

（二）社区发展逻辑

研究表明，部分社区严重依赖与国家公园林业相关的活动来维持生计[32]。且在国际社会，绝大部分国家并未采取将原住民全部迁出或牺牲原住民利益及其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形式进行保护[33]。因此，国家公园不仅要成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地，促进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开发，还应把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与社区发展有机融合[34]。实现原住居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引导社区参与显然至关重要[35]。此外，国家公园要落实完善的保护政策，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参与，需要关注社区发展的现实问题。不以促进周边社区发展为目标之一的国家公园建设，注定会缺乏动力、存在阻碍，而落后的社区景象也必然会给国家公园进一步的发展带来困难。相关部门应正确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到国家公园的发展建设中来，引导居民承担国家公园的部分保护和管理工作，并给予一定的资金和福利支持，进而激发社区居民保护意识，提高社区居民保护积极性，通过社区参与带动社区脱贫致富，刺激社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因此，从现代化建设及社区自身角度分析，社区参与是国家公园社区取得良好发展的保障。

（三）生态文明建设逻辑

学界普遍认可国家公园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涵，国家公园助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36-37]，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推动我国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项重要举措。2017 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被列为我国新时代发展的基本方略，揭示了保护自然和促进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石。2020 年党的十九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届五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性,并指出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对国家公园建设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层次的发展目标。国家公园建设要落实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不得不面临人和自然的双向问题,人生长和生活在自然环境中,自然存在于人类社会之间,自然保护和生态维护离不开人的参与。在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然要求自然与人相辅相成,相互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是既要考虑自然又要照顾人类需求的过程。周边社区居民是与国家公园联系最为紧密的“人”,国家公园公园范围内的社区居民既是国家公园“最严格保护”中受影响最大的利益相关者,也是“最严格保护”最重要的执行者,还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直接的实践者[38]。因此,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分析,社区参与是国家公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

三、构建国家公园建设中社区参与模式的实践路径

我国国家公园的社区参与存在系列突出问题,为进一步推进居民参与公园管理与规划,缓解人地矛盾,全面落实保护区生态政策,亟需针对性地给出促进社区参与的方法,主要包括拓宽社区参与渠道、为居民提供保障、培养参与能力、提升环保意识(图2),从而为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参与开辟道路。

(一)拓宽产业带动的社区参与渠道

渠道是参与的基础和前提,拓宽国家公园的社区参与渠道是十分必要的,否则,一味地强调国家公园引入社区参与的重要性,而不解决实际参与中的渠道短缺问题,不为当地居民提供实实在在的社区参与渠道,无疑在行动上仍是将社区居民置于国家公园之外,社区参与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为进一步拓宽国家公园的社区参与渠道,我国应坚持以产业带动来解决居民就业问题,本研究从不同产业形式的角度来丰富社区居民参与的途径和方式,主要分为三大类:居民居主导地位的生态农业渠道、居民参与型的生态旅游渠道、居民复合型的特许经营渠道(图3)。上述方式可以确保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的多方面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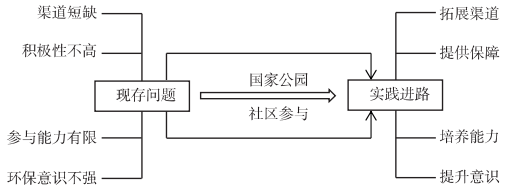

图2 国家公园社区参与总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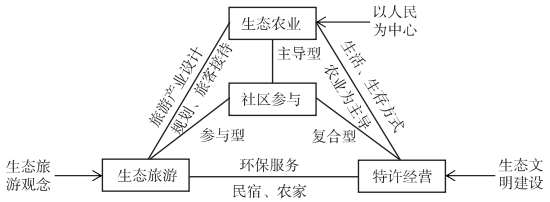

图3 国家公园社区参与渠道框架

1. 模式一:生态农业模式——主导型

模式特色:农业一直是国家公园内居民的主要生产方式,国家公园规划范围广,作为现阶段最典型的一种保护地类型,公园范围内及周边涉及多处偏远、落后社区,社区居民仍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我国国家公园坚持最严格保护的生态原则,为保障周边社区居民权利和利益,不过多干涉公园原有的正常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当地农业仍要以社区居民为主导,保持原住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支持社区居民参与要以发展生态农业为主。生态农业区别于普通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要始终将保护环境放在首位,进行绿色种植,促进国家公园环保工作,将绿色发展落实全面、彻底。

模式理念:国家公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思想,只要在环境许可范围内,居民原有的生活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方式和生活习惯可以加以保留，社区居民仍坚持其原有的农业种植模式，在绿色发展观思想的指导下，大力发展新型生态农业为主导的社区参与模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将农业加以适当限制和引导，发展生态农业，形成国家公园的社区参与特色。

2. 模式二：生态旅游模式——参与型

模式特色：生态旅游是国家公园发展的必然趋势，社区居民要积极参与生态旅游建设。社区居民在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建设过程中，扮演参与者的角色，要对自然资源、当地原生文化、传统知识进行保护，突出旅游中的生态性和社区特色。国家公园生态旅游模式要保证居民在旅游产品设计、旅游规划实施、访客接待、园区服务等多个方面进行参与，并使居民在国家公园保护和社区发展中合理获取经济利益，造福于当地社区。同时，社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要依靠居民对当地环境的了解，向访客讲解或宣传公园的保护，帮助访客获得更真实的国家公园游憩及科考体验，在生态旅游中发挥更到位的社区服务作用。

模式理念：国家公园发展的生态旅游模式不同于原来一般景区的普通旅游形式，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不以赚取门票收益等盈利行为为目标，不是由某单一企业所管理和运营的，国家公园所有权属于国家，开展生态旅游模式目标侧重于保护资源，注重国家公园生态及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文化资源的全民共享，是发展国家公园大旅游的一种形式。生态旅游模式以满足国家公园内访客的游憩、科考、康养等体验活动为主，从而吸引社区居民积极配合。

3. 模式三：特许经营模式——复合型

模式特色：我国正式设立的国家公园及原有体制试点区纷纷探索特许经营模式，结合区域特点，协调处理好生态保护与合理利用之间的关系。支持社区参与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模式，居民将扮演主导者和参与者的复合型角色，并承担相应责任。在国家公园发展特许经营过程中，社区居民作为个体申请工作岗位进行参与，为国家公园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服务、日常管理与运营提供帮助，为被特许企业或单位提供脑力或劳力，从而获取一定的报酬以促进生活水平提高；社区整体、社区企业或居民通过投标、投资方式参与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项目，作为特许经营模式中的主导者，直接对接政府，承担国家公园特许范围内的民宿、农家乐、访客体验等项目运营，在合同许可范围内拥有国家公园经营权，直接获取特许分红，或对外来特许企业进行投资，形成社区参与的另一种形式。

模式理念：社区参与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模式，是一种创新产业带动的居民参与方式，摆脱了居民一直依赖当地农业发展的旧模式，创新性地引入国家公园特许项目，支持社区居民丰富多样的参与形式。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模式坚持保护地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原则，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目标，使社区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明确社区居民参与的重要性，增强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形成社区居民对国家公园发展的认同感和对当地社区的归属感，促进国家公园生态资源更好的保护与利用。

（二）完善生态发展的社区参与保障机制

社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积极性不高，归根到底还是保障机制的缺失，导致未能全面消除居民参与的顾虑，从而阻碍社区参与。要提高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应从多方面完善国家公园生态发展的社区参与保障机制，主要包括资金、法律、政策、制度四个方面。（1）资金保障。经费短缺作为我国保护地发展的最大障碍，严重制约了生态补偿作用的发挥，国家公园作为我国保护地的主体，现阶段主要依靠财政拨款进行生态补偿，单一的方式给财政造成了一定压力，且财政补偿资金有限，不能完全满足国家公园发展之需。我国国家公园应采取多渠道、多方式的资金筹措模式，创新特许经营吸纳资金、利用集体力量支持社会捐款、开展高质量生态旅游活动以适当盈利，建立科学高效的资金保障机制，满足社区参与和生态保护的资金需求。（2）法律保障。国家公园社区参与需要形成完整统一的法律保障体系，从国家层面用法律法规明确社区参与的重要性及社区参与的方式、范围，保障居民参与中应有的权利，促使居民积极参与到国家公园建设中来。（3）政策保障。政府公布与国家公园周边居民利益和社区发展目标息息相关的政策，形成政策优势，吸引居民参与；对社区参与制定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具体措施,规范社区参与行为,奖励居民参与国家公园保护和建设,提高当地政策对参与的扶持力度,形成政策保障。(4)制度保障。设立专门的国家公园社区管理部门,由政府直接安排领导成员或在当地社区选举产生,组建形成完整的社区事项管理队伍,处理社区内部与外部事项,为居民参与形成规范管理和制度保障。

(三)提高国家公园的社区参与能力

现阶段随着我国国家公园加速发展,对人才需求也在不断提高,而社区居民能力短缺是阻碍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要促进社区参与,亟须提高国家公园范围内的社区居民参与能力。国家公园的社区参与能力包括管理和服务等综合能力,提高社区居民参与能力,其一,要制定培训计划,定期开展集中培训活动,邀请专业管理团队、服务团队、环保专家等定期开展知识培训讲座,从思想上提高社区居民对国家公园的理论认识,形成正确的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观,同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要带领社区居民在国家公园的实际环境中不断训练,在实践中增长见识,培养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其二,政府要重视国家公园周边社区的教育问题,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国家公园周边地区的教育水平,通过开展教育活动为国家公园建设培养当地人才,提高当地居民自身的综合素质和参与能力,造福于社区,促进社区长远发展与国家公园建设。

(四)提升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

环保意识是国家公园社区参与的基础,明确国家公园保护的重要性和实践价值,知晓居民参与保护的地位和积极作用,有利于激发居民参与国家公园的积极性,有利于提升居民的价值感、自豪感、自信心。首先,通过教育进行引导,向居民宣传、讲解国家公园资源的珍稀性、独特性、代表性,说明生态系统和资源破坏的严重后果,增强当地居民对国家公园环境的认识,使其全面理解开展保护和参与的作用,从而提升居民自身保护意识。其次,积极开展社区居民环保知识培训和考核,制定定期考核制度,针对考核结果进行适当奖惩,形成居民对国家公园的常态化环保思想。最后,定期组织社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增强居民对国家公园动植物的感情,引导居民参与保护,提升环保意识。

四、结语

国家公园的发展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一直是全世界讨论的重点。我国高度重视生态环保工作,也强调民生保障,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与其周边社区居民发展,便是二者的现实问题具体呈现,虽然许多学者纷纷探索了国家公园建设中社区参与及管理模式,但对其现实形势与面临难题的分析并不透彻。

因此,运用文献回顾法,本研究得出:现阶段我国国家公园范围广、面积大,缓冲区社区数量多、分布散,存在社区经济水平落后,居民受教育程度低等现象,造成当地居民环保意识不强,参与积极性不高,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和规划的认识不到位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理论分析法和归纳法,从人地矛盾、社区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角度出发,研究得出社区参与是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必然选择。为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解决社区参与困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本研究提出了参与模式的实践进路。首先,拓宽产业带动的三种社区参与渠道,分为居民主导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居民参与型的生态旅游模式、居民复合型的特许经营模式,解决公园周边居民就业问题。其次,建设资金、法律、政策、制度四层保障机制,消除社区居民参与的多重顾虑;通过集中培训、专家引进,提高居民参与能力对居民教育和引导,提升国家公园范围周边社区的环保意识。综上,通过带动社区力量,共同助力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实现国家代表性资源的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为国家公园社区管理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理论借鉴,进而推动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完善。

[参 考 文 献]

[1] 秦天宝,刘彤彤. 央地关系视角下我国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之建构[J]. 东岳论丛,2020,41(10):162-171.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 赵鑫蕊,何思源,苏杨. 生态系统完整性在管理层面的体现方式: 以跨省国家公园统一管理的体制机制为例[J].生物多样性,2022,30(3):178-185.
[3] 丁姿,王喆. 生态安全观视域下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研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J].青海社会科学,2021(2):28-36.
[4] 张文松. 国家公园生态利益保护的理论证成与规范进路[J].青海社会科学,2020(5):120-129.
[5] 胡官正,曾维华,马冰然. 保护地区域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路线图: 以三江源地区为例[J].生物多样性,2022,30(2):169-179.
[6] 邱胜荣,赵晓迪,何友均,等. 我国国家公园管理资金保障机制问题探讨[J]. 世界林业研究,2020,33(3): 107-110.
[7] 杨朔,雷小雨,赵国平. 秦岭国家公园社区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意愿的影响[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1,36(12):71-79.
[8] 张引,杨锐. 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共管机制构建框架研究[J].中国园林,2021,37(11):98-103.
[9] 何思源,魏钰,苏杨,等. 基于扎根理论的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机制研究[J].生态学报,2021,41(8):3021-3032.
[10] 钟林生,肖练练.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路径选择与研究议题[J].资源科学,2017,39(1):1-10.
[11] 汪家军,崔晓伟,李云,等. 钱江源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统一管理路径探索[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1,34(2):22-28.
[12] 马洪波. 探索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发展的新路径——UNDP-GEF 三江源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的启示[J].青海社会科学,2017(1):35-40.
[13] 李若山,贾卫国.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对社区经济的影响[J].林业经济问题,2020,40(5):455-463.
[14] 李明起,刘芳璐,黄德林. 生态文明视角下国家公园原住居民就业问题研究——基于神农架国家公园实地调研[J].安全与环境工程,2020,27(1):1-5.
[15] JOB H, PAESLER F. Links between Nature-based Tourism, Protected Area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rises—The Example of Wasini Island (Kenya)[J].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 2013, 1/2: 18-28.
[17] 周正明. 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参与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3(15):205-207.
[18] 周睿,曾瑜皙,钟林生. 中国国家公园社区管理研究[J].林业经济问题,2017,37(4):45-50.
[19] 肖练练,钟林生,周睿,等. 近 30 年来国外国家公园研究进展与启示[J].地理科学进展,2017,36(2):244-255.
[20] 罗丹丹. 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社区参与机制构建[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4):34-38.
[21] 修新田,陈秋华,赖启福. 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155-159.
[22] EAGLES P F J. Trends in Park Tourism: Economics, Finance and Management[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2, 10(2): 132-153.
[23] 徐菲菲. 制度可持续性视角下英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和管治模式研究[J].旅游科学,2015,29(3):27-35.
[24] 丁元竹. 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5] 肖林. "'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J].社会学研究,2011,26(4):185-208.
[26] 者荣娜,刘华.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中社区权利新探[J].世界林业研究,2019,32(5):72-77.
[27] 高燕,邓毅,张浩,等. 境外国家公园社区管理冲突: 表现、溯源及启示[J]. 旅游学刊, 2017, 32(1): 111-122.
[28] 陈涵子,吴承照. 社区参与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的模式比较[J].中国城市林业,2019,17(4):53-57.
[29] COLCHESTER M. Beyond "Participation": Indigenous Peoples, Biological 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J]. Unasylva,1996,47(186):33-39.
[30] 杨锐. 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J]. 中国园林, 2001, 17(1): 62-64.
[31] LI W J. Community Decisionmaking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33(1): 132-143.
[32] 苏杨,王蕾.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相关概念、政策背景和技术难点[J].环境保护,2015,43(14):17-23.
[33] HASAN E, BAHAUDDIN K M. Community's Perception and Involvement in Co-management of Bhawal National Park, Bangladesh[J].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s Research, 2014,6(2):60-67.
[34] 刘红纯. 世界主要国家国家公园立法和管理启示[J].中国园林,2015,31(11):73-77.
[35] 兰伟,陈兴,钟晨. 国家公园理论体系与研究现状述评[J].林业经济,2018,40(4):3-9.
[36] 侯艺,许先升,陈有锦,等. 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社区共管模式与经验借鉴[J]. 世界林业研究, 2021, 34(1): 107-112.
[37] 张利涛,卢艳香,朱颜,等. 青海以国家公园为载体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J]. 生态经济, 2019, 35(10): 212-216.
[38] 赵智聪,钟乐,杨锐. 试论生态文明新时代自然保护区之基础性地位[J].中国园林,2020,36(8):6-13.
[39] 董茜,邓毅,高燕,等. 中国国家公园的社区共管模式特征及管理分类——基于社会资本理论[J]. 环境保护, 2019, 47(24): 45-49.

(责任编辑　余　敏)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China'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when it adopts the double differenc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to identify the influence. Secondly, in terms of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it find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n these enterprises' export consists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brand and the expansion of trade margin. This study sheds light on China's br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xport diversification.

(6) The ecological threshold of native inhabitants in a natioal park and their protective effect in the ken of nature-culture dual resources *ZHANG Zhi-guang, ZHANG Yu* • 59 •

Anational parks helps in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heritage of human civilization. Local residents in national parks leave their carbon footprints though they protect the local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cological threshold of local residents under the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constraints of national parks. It firstly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f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the ensuing problems. Then,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theory, it establishe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measurement models for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ecological threshold of national parks and local residents respectively. An empirical study conducted in Wuyishan National Park shows that the above measurement method has good feasibility and validity. Finally, a super-loop model of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national parks is constructed to determine how to manage the local residents.

(7)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dilemma and solution

GENG Song-tao, ZHANG Hong-xia • 70 •

As a response to the government'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lan,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is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of how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government, local community and nature.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 local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erms of human-land conflict, community develop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can be carried out in four aspects. First, increasing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by encouraging local business in agriculture, tourism and franchising. Second, providing solid financial, legal, and policy support. Third, fostering the residents' awareness of participation. Fourth, raising their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8) A new height in legal education in the ROC period: School of Law i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ZHANG Ren-shan • 78 •

When the School of Law, NCU was founded in 1928, it had three departments: Law,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Thanks to the dynamism of the newly-founded ROC government and the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of NCU, the School recruited a number of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of excellence.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NCU moved to Chongqing where three new departments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School: Sociology, Frontier Politics and Law (judicial group). The legal education program in the School reached a new height in the period of ROC: it provided education in a wide array of disciplines though it started late among Schools of the same kind; it boasted a galaxy of professors and made great academic accomplishments; it nurtured excellent graduates who went on to become influential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1927 to 1949, the School had ranked first in the field of legal education. Though the universities noted for legal education were said to be "Chaoyang in the North and Soochow in the South", "NUC in the Middle" should also get on the honor roll.

(9) Incorporation and express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Environmental Code*: a perspective from the revision of the *Circular Economy Promotion Law* *ZHANG Zhong-min, HOU Zhi-qiang* • 91 •

Current studies in c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de* has not yet formulated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a strict sense. Because this concept is largely embodied in the *Circular Economy Promotion Law*, a subsystem of the *Code*, the *Law* provides a proper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concept and the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interests and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To establish the ecological limits of the *Law*, we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otal control. To materialize the concept in the *Code*, we should pinpoint the behavior law with enterprises as the subject of a duty, set the dual structure of "control + prevention" and legalize the "double carbon" policy.

(10) User portrait of aviation insurance: a comparison of the situa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break of major public events *YANG Bo, YANG Xiao-wei, LIU Xin-ru, DU Wan-yue* • 101 •

Driven by a new wav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digital economy has been developing so rapidly that data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production. In this environment, enterprises need to use big data to thoroughly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users. "User portrait", an important user analysis tool, emerge as the times require. When major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